

辛茜主编《中国散文年度精选》：

栖居心灵的审美诗学

□李一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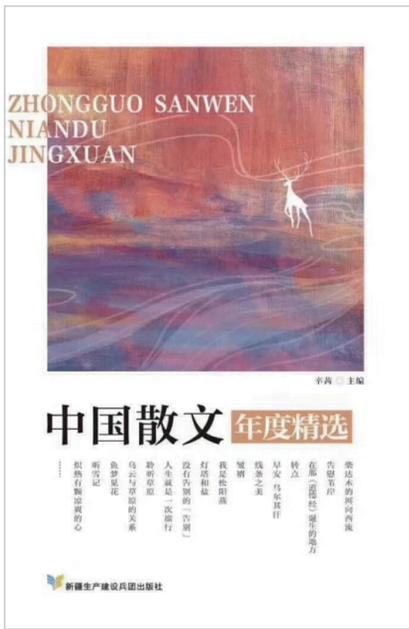
散文家辛茜主编的《中国散文年度精选》付梓出版，这是散文界的一件盛事。每逢年终对过去一年的散文创作予以筛选集结，不遗过往，不缺席在场，虔诚捡拾，阔大包蕴，犀利透视，寥亮人心，这本是散文经典化之举，亦是选家之初衷。

中国当代散文深深植根中华大地，当代中国人行走于华夏自然山川，跋涉于社会现实生活，洞观这块古老而青春的土地上时代风云变幻，饱满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斯激荡。何以将自身的价值取向、心性气质和文化情怀尽情袒露？如何自由绽放精神诗性、尽兴呈现独特艺术趣味、着意表达执著精神追求？散文，或恰是赖以展示他们充盈丰富诗性内涵和审美诗学品格的文体。

文学乃精神的外化。精神的品格，决定文学的品质。散文作为人类观照世界的一种创造审美形式，是散文作家主体精神的一种自由审美载体。相较于其他文体，散文无疑是个体生命经验最直接、最自如、最自由的诉诸与表达。它不仅饱含作家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等客体世界的深刻体验与揭示，更是作家心灵的真实自传。

优秀的散文创作，要求散文作家首先要葆有内在于生命的主体能动性，抱持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坚守对世俗的警觉和反抗，着力探寻生命的根本价值和终极意义，从而使文本成为作家自由的而不是桎梏的、个体的而不是群体的、关注生命的而不是见物不见人的、审美的而不是功利的把握、体验和垂询。2019年度精选中的散文，大多具有这种品格。邵燕祥的《说“天”》，洋洋洒洒，纵横捭阖，从古到今，由中及外，兼及科学与人文，对“天”做了全方位考察和探究，畅言“天所不容者，首先是逆天而行的，不合理的一切”，并深刻评说“历代皇帝自称天子，奉天承运，受命于天，来君临天下。他们所发的‘大’之言也成了跟‘天命’并列的必须敬畏的金科玉律”。堪称言自己之志，抒独立之言，杜绝公共体验、公共话语，抒写特质性、创造性经验。李汉荣在《水边的智者：重读〈道德经〉》一文中，直面现实，真切表达自己的认知：“在人堆里能挤出聪明和狡猾，很难提炼出真正的智慧”，进而发出“我们还需要一种高度、一种空旷、一种虚静，去与天地对话、与万物对话、与永恒对话”的呼吁。谢大光的《告慰苇岸》，借苇岸之语，浇自己块垒，“生物多样性的逆向生长，不止影响到人的生存环境，更严重地隔绝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从而肢解了人的完整性，人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变成了机器，甚至成了机器的机器”。可谓振聋发聩，直击现实。

优秀的散文创作，必然是散文作家个性的真实的心灵呈现。周作人曾宣称，散文不仅是自己个人的，而且还带有“真实的个性”、“真的心搏”。刘半农明确提出：“尝谓吾辈做事，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心灵所至，尽可随意发挥”。李素伯推崇小品文的意义和特质在于“作者最真实的自我表现与生命力的发挥，有着作者内心的独特的体相”。奥地利著名作家、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指出，“关于写作，你不可能写出比你更真实的东西”。王宗仁在《柴达木的河向西流》中表达了一个青藏线上的老兵对战友的深情缅怀和对逝去岁月的深切流连：“一本《可爱的柴达木》被几张照片遮掩得只露着‘柴达木’三个



字”，“我像饿极了的汉子，抓起这本书就读了起来。两只眼睛如同铤犁翻地般的快速插进字里行间，浏览，心神掉进书里不能自拔”，“踩着催征的哨音，三进三出食堂。拿起那本书放下，放下又拿起”。一个酷爱读书的战士形象毫发毕现。张守仁在《在那〈道德经〉诞生的地方》倾情表达对道德经的尊崇，不惜用“我个人认为，把我编选的10人的名作加在一起，放在天平上称，其重量不如一册五千言的《道德经》”。极而言之，坦露心迹。阎晶明的《燃烧到最后一刻的写作者》不以红柯创作业绩丰硕而渲染，亦不如同类文章极力表白相互间关系，而是沉静地表达对红柯的印象，作者冷静而蕴含热烈、理性而不乏感性、纯粹而有着通达的个性跃然笔尖。狄德罗说，“任何东西敌不过真实”；巴金说，“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强化主观情绪，凸显生存感受，逼近生命之实，切近灵魂之真，表达真的自己，描绘绘心的体验，警惕陷入虚无、虚假、虚伪境地，先哲的嘱托，无疑是散文创作者应该牢记的箴言。

优秀的散文创作，总能散发出独特的艺术趣味。“趣味”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既与具体文学艺术鉴赏实践相联系，又与文学创作主客体相关联，是特定主体的感性达成，也是主客体之间的完美契合。在西方美学史上，作为一种审美学范畴的美学特征，“趣味”与主体的生命、情感、体验等审美心理密切相关。事实上，山水之趣、生活之味、文化之意，只因契合知识分子的心灵，便自然焕发出异样的别趣、深长的意味和悠远的回响。赞赏2019年散文，我们自会领受到作者那自由不拘的精神放飞，个性

凸显的兴会情味，艺术营构的相异旨趣。梁衡的阔达与哲思，朱以撒的书卷与闲散，潘向黎的明慧与隽永，冯秋子的感性与沉思，杨晓升的明澈与宁静，查干的纯净与空灵，穆涛的驳杂与悠远，韩小蕙的智慧与深情，傅菲的独语与绵远，王兆胜的坦荡与真诚……无不体现了“文词与思想”之外，自具的一种“风致与趣味”，那是人生态度与审美情趣的相契，是人生价值与审美追求的圆融，是人的气质与文的风格的统一。如果没有旷达与隐逸，放诞与温厚，狂与狷，愤激与闲适，华丽与朴素，幽默与庄重，冲淡与浓烈等各种艺术趣味的存在，散文哪会具有興味盎然、情味绵远、意味悠长、百味杂陈的艺术魅力？

优秀的散文创作，绝不拒绝散文创作手法上的多元创造。细考2019年散文，在文体的语言表达、结构营造、叙述选择等各方面都有创造性呈现。在结构上，散文文体形态自由呈现，形态多样，令人目不暇接：有随性化，不讲起承转合，摒弃上下承接，阻拒左右衔接，缘情而发，顺意起笔，随物赋形，尽兴抒写个人体验和感受，行即行，止则止；有冥想型，将瞬时感觉和情绪投射到自然景物、文化景观或社会现实生活上，继而展开想象，自由发挥，个人感兴的时间沧桑感与广阔浩渺空间感糅合一起，别有一番情味在其中；有注重意象营构，构成一个个意蕴丰富的审美空间；有混合型创造，将游记、散文、诗歌和小说笔法融而为一，把地方志、风俗志、民间传说引入散文创作……这种种结构形式，使散文摇曳出多彩多姿、错落有致的文体之美。在语言上，所选多数散文体现出创造的旨趣，既继承传统又打破规范，既不泥古又尚创造，既大胆吸收外来语言又不生硬接受，使语言这种符号化了的人类情感形式，成为诗意栖居的存在家园。在叙事上，多呈谈话式、自语式叙述，仿若老友之间对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任心闲话和精神漫步，又如作家自言自语，坦露坦率，无话不说，无感不发，无所保留，或闲适，或畅达，或沉郁，或朴质，使人从中感受到自由美好精神的快意。质言之，散文创作本然是“主体与世界的充分对话”。

概而言之，2019年散文，无论是从精神意蕴上，还是在外部形式上，都表现出良性发展。这种发展，源自主体自由的精神、开放的心灵，源自时代的巨变、社会的进步，源自当代散文作家对传统的扬弃、对外来因素的借鉴，散文这种文体形式，适应了当代人的审美精神和文化心理。2019年散文，必将成为当代散文经典化的重要收获。



最早关于讽刺的论述，出自《文心雕龙·书记》，“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叙事相达，若针之通结矣”。唐代诗人高骈《途中内黄马病寄僧舍呈诸友人》有句“依违讽刺因行得，澹泊供需不在求”，“讽刺”一词由此进入中国文学。《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高峰，受到鲁迅高度肯定，“追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世界文学名著《巨人传》《格列佛游记》《堂吉珂德》等，都以讽刺见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老舍、钱锺书、张天翼等，都写出了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阿Q、马裤先生、方鸿渐、华威先生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画廊中鲜明夺目的人物形象。蔡中锋的微小小说创作，正承继这一传统而来，在当下语境中，赋予讽刺小说新的生命力。

《儒林外史》“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主要针砭为科举考试毒害，一心想通过读八股文章，科举考取功名，求得荣华富贵的读书人。蔡中锋在机关工作多年，经历多个岗位，对一些不良作风习气，有亲身体验、有独到观察、有深入思考，为创作讽刺微小小说奠定了深厚基础。

发表于《人民文学》1997年第二期的《舅舅的烹调术》，写在县宾馆做大厨的舅舅根据企业老板和职工代表不同饮食需求，做了一全素、一全荤两样菜席，结果获得全面好评的事。读来很有趣、很有道理，也很有独到之处，但似乎与“讽刺”搭不上边。其实不然，讽刺的匕首和投枪，隐藏在叙述之下。县里的“50强企业”效益普遍很差，职工生活困难，厂长经理们却过着豪华生活，“大鱼大肉，吃不完，用不尽，有时候那几台冰箱冰柜装不了，送人又怕落影响，不得不半夜起来拿出去扔掉”。一个整天待在县招待所后厨间的厨师都一清二白的事，主席台的领导能不知道？不是不知，而是不管。不仅不管，还就势作文章。小说结尾“几天以后，我在省报上看到了一篇通讯，题目是《会议用餐全部素食安排 廉政建设已从小事抓起》，报道的正是我的家乡的那次城市经济工作会议上，舅舅做的午餐”。作品就此结束，却将讽刺的矛头刺向了更高的层面，不仅县里，省报也不做深入调查研究。

鲁迅专门写了《什么是“讽刺”》一文，为讽刺下了定义，“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蔡中锋以微小小说这一最为精炼的体裁，寥寥数笔，一两个取自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情节，某个任职于机关的小领导或办事员，似乎略带夸张的情节细节，便构成了精彩巧妙、令人叫绝的作品，为某些人、某些作风画了漫画像，不仅形似，关键是神情毕肖，直击灵魂。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名篇，蔡中锋的微小小说，也自觉学习其精髓。

不过，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巡警还有“机会”和将军发生联系，蔡中锋笔下的人物则要“基层”得多，基本聚焦于县一级，极少数“上升”到地级市。这与他长期在市县机关工作的经历有关，也显示了作家立足生活、取材于生活的创作态度，不拔高、不降低、不虚美、不隐恶。

刊载于《小说选刊》2018年第12期的《中华神耳》，主人公是在某县机关当了20年秘书的张华，典型的小公务员。张华练就了一付“听脚步声辨人”的绝活，屡试不爽，甚至听出了局里的美女和局长昨夜有故事，却听不出自己农村父亲的脚步声。讽刺的矛头首先当然是刺向张华的。孝乃人伦之本，张华连生他养他的亲爹脚步声都听不出来，却能分毫不差地分辨出局领导和领导特定关系人的脚步声，可以想见平时把心思都用在什么地方了。作品还向张华的同事们表达了讽刺的态度。在上者盛气凌人，在下者小心翼翼，得意则步履轻浮，失意则意志消沉，更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者。无论哪个机关单位，这种作风态度，是不可能牢记使命、履行责任的。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机关工作，最突出的作风问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蔡中锋对此了解很深，表现准确。《紧急电话》就是一篇讽刺官僚主义的佳篇妙构。河流遇险在即，赵县长明明有驻守在大堤上的工程师老郑的电话号码，却觉得不能“越级指挥”，于是打给副县长，副县长打给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打给局长……层层下达，再反过来层层汇报。程序还没走完，洪水已冲到县政府大院。每个人似乎都正确、及时地完成了自己负责的“环节”，都无可厚非，都符合“程序正义”，却“集体合作”酿成大错。河流出险，十万火急的事，县里大小领导却只满足于落实电话，“当官做老爷”的嘴脸，跃然纸上。

与官僚主义同行的就是形式主义。《两亩麦子的收割权》，更以黑色幽默，揭出了某些单位进行学习实践、深入基层活动摆样子、走过场，劳民伤财、变形走样的不良现象。通常批评形式主义是“认认真真走过场”，这篇微小小说却深刻地揭示出一个道理，如果抱着“走过场”心态，越“认真”，结果就越变形，实际效果也就越差。而形式主义可能不仅仅是表面文章，人浮于事，夸夸其谈，形式大于内容，后面隐藏的，可能是腐败问题。正如某局用3000元买下二亩麦子的收割权，却向市财政申请了30万元经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量推进反腐倡廉事业，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微小小说是文学的轻骑兵，兼具文学性和新闻性两大特征。蔡中锋敏锐观察、细致体察、出色表达，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以讽刺手法，画出腐败众生相。

最有趣的当属《鸳鸯名片》。市长夫人把自己的名片和老公的名片印在一张卡片的正反两面，找人办事时递上老公的，也就是市长名片的一面，然后假装错了，再翻过来。这一招果然有用，事情全部顺利办成功。当然，即使再嚣张跋扈、不懂规矩的人，也不会用这办法，属于“不是曾有的事实”，但读者都会会心微笑。全家上阵、夫妻贪贪的例子屡见不鲜，“腐败代理人”也大有人在，《鸳鸯名片》谁是正面、谁是背面？其实是一体两面、合二为一的。

鲁迅说：“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蔡中锋对于讽刺的对象，有不满、有批评、有谴责，甚至还有憎恶，但始终知道，讽刺的对象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就在身边时时存在的机关小公务员，并非坏人，而是受不良作风影响的普通人。作者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非“一味谴责，过甚其辞”。

蔡中锋谈微小小说创作时说，“微小小说是一种智慧”的文体”。的确，讽刺是需要智慧的，古今中外的讽刺文学大师，无不拥有高度智慧的哲人。智，是见识，慧，是觉悟。卓越的见识，透视出自以为是掩盖的低级错误，高度的觉悟，发现了假装高贵装饰的实质卑微。而表现方式，“要像放大镜一样，将小处放大，以小见大。像哈哈镜一样，将要写的素材加工变形，使之更能突出主题”，这种“突出”和“放大”，不仅是写作手法，更是基本的创作态度。不仅使习以为常的缺点错误，经由艺术变形手法而更加显眼突出，而且用此一点，活画出人物的灵魂。让读者看到，如不及时纠正救治，造成的就是变异的人格。这种变异，看似无形的、细微的、不引人注目的，但正如“无物之阵”，习焉不察，却无处不在，对工作、对事业，将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

60年前的王履辉怎么会想到他会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名小说家，而且是一位长篇小说家呢？可事实上，正是如此。

1958年，王履辉赴扬州求学，恰逢扬州工专的大炼钢铁与教育改革运动。不久，学校因配置师资而选派他到扬州师院进修文科。1960年结业回学校，在语文学科教研室任教。课时之余，他萌发了创作欲望，写了数十万字的小小说草稿。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国裁并高校、中专，他又续读“工民建”专业，暂时搁下了小说创作。

他双栖于建筑、文学两个不同领域，并为最终实现“文学梦”而做好一切准备。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在筹建工厂之余，一鼓作气，创作了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高楼深院》。这是我国较早精细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1972年初冬，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王履辉：“稿中的爱情与男女关系，几乎成为这部稿件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似不妥。”建议增加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内容。1973年初夏，出版社对修改稿进行二审后又约谈王履辉，请作者再改。三稿终因他在市级机关忙于基建并执教“土建班”而拖延了时日，几经修改杀青全稿时，中国已进入到了翻天覆地的历史转折期，小说因主题不宜而流产。

历史滑行至上世纪80年代，厚积薄发的王履辉一发不可收。他既是一名颇有建树的建筑工程师，又是一位以写他熟悉的各种“建筑工程”见长的小说家。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游走于“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边锋。改革开放的中国，既给予他专业的热情，又给予他艺术创造的冲动，讲述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塑造一个个鲜活如生的形象。他对于小说创作的艺术构思，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故事的衔接、层次的推进、形象的多元，以及语言的提炼、意境的张力、内蕴的开掘等等一系列小说创作的诸般要素，都能如建筑工程力学上的“卡尼”配置法一样，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呼应，使整部小说的人物众多而结构清晰，情节复杂却驾轻就熟，一气呵成，呈现一种鲜活而运动着的既严整又开放的态势。林林总总，体现了以建筑工程师的身份来驾驭另一个全



新领域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巨制的独特风范。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部部长篇《情满波斯湾》《沧桑梦》和《天道酬正》。

《情满波斯湾》曾在《文汇报》发表故事梗概。在第三届全国书市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在《解放日报》上作了郑重推荐。小说描写改革开放之初的华建公司，奋战在波斯湾异国他乡，主人公宗英不但是事业上的女强人，力排众议，践行“分队包干”责任制，取得K国的免检信誉，而且她还是个内心丰富多情的女子，当她得知丈夫将要被重夺夺去生命时，其形象又增加了几许悲剧色彩。小说的感染力是将人情、人性这些细微的“小故事”与改革开放、国家形象这些恢弘的“大故事”，水乳交融、不露痕迹地结合得恰到好处。“作者以文学的手法将华建公司成功地作为整

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并把它纳入到宏观之世界大循环的轨道中，无疑是有其深远意义的……”（郑理《情满波斯湾》读后感》，《三角洲》1990年第3期）。这部处女作《情满波斯湾》，一出手就显得非常老到，“女强人”宗英在小说中还另有一重身份，即担任作者在整部小说中的观察基点。作者以她的一系列活动为经，以整个故事矛盾运动发展为纬，将小说串联了起来，因此，小说才显得颇为紧凑简练。王履辉的小说创作得益于他的工科出身，细腻而不琐碎，兼顾而各自成章。这种独特的身份标识，不仅未成为其小说创作短板，而促成其将繁复变简易、模糊变清纯，且构思与行文潇洒自如。处女作大获成功，《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都发了简讯，在当

时文坛颇具影响。

《沧桑梦》的结构就不同了，作者在勾画历史画卷中塑造人物，展开故事。上部《三十年在河东》，那30年历史是一个运动衔接着一个运动，是由一条总线始终纵向贯穿着的历史。小说围绕江海工学院的创办与停办到复办，叙写了命运沉浮，以及众位小辈的感情纠葛。再现了建立新中国的欢愉，社会主义改造的轰烈，以及那段动荡的“政治运动”岁月。而下部《三十年向河西》的构思却明显不同。由于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推进展开，作者采取了横向构思，以一个特定的合资企业展开横向叙写。刻画了1978年后社会观念的转变、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的阵痛、随之而来的人性的变化。《沧桑梦》正是用一纵一横的全方位的艺术构思，将历史作了形象化的真实还原。

《天道酬正》则是以老子“天道”思想切入当下现实，是社会大转型时期的“百相图”。小说通过一只波斯猫独特的眼睛看世界，金色眼有权，银色眼看钱，在金银眼催化下，开启了第三只眼看女人。它为我们揭示了社会转型期的一种丑恶现象。还是那只猫，以它的瞎眼昭示丑恶注定会终结。瞎眼猫生下了正常猫眼的后代，那是美善的生生不息，是天道的永恒。小说既有悲怆人生与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有与时俱进、共创辉煌的赞歌。在人生的悲喜剧中扬善惩恶，善者天助，恶者天诛，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反腐主题贯穿始终。

王履辉在文学创作上属大器晚成，所以他的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几乎三位一体。他擅写人，擅写故事；而且他擅写“人”中的群像，擅写“故事”中的小故事，发展中的故事、铺垫中的故事。因此，他的小说好读，耐读。他的很多拥趸或曰“粉丝”们，喜欢他，并非奔着所谓的微言大义而去——尽管他写出了个置于转型时期的伟大时代，而是奔着他笔下丑丑、悲喜的诸般人物和或乡野或荒诞或戏谑的珠联故事而去。小题材、小场景、小氛围，恰到好处地衬托和展现了大题材、大场景和大氛围。这就是王履辉小说的高妙之处。